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亡灵祭坛】	陈寅恪之死	李 舒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九）	吴中杰
【广阔天地】	“两个世界”的交叉（下）	叶维丽·马笑冬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亡灵祭坛】

陈寅恪之死

· 李 舒 ·

从1966年开始，“学问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可是他不敢随便问别人。

他只敢问自己的助手黄萱。文革一开始，黄萱就被赶走。她若要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

有一次，她去见陈寅恪，陈寅恪问她：什么是“反动”？黄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候，陈寅恪已经是“反动学术权威”了。学术权威，他知道，但，什么是反动？他想不明白。

一

1966年冬天开始，陈寅恪开始写一份又一份的书面检查交代。检查写好交上去，被批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再重新补充交代。

那支曾经写出《柳如是传》的如椽巨笔，现在每天写出的，就是那些检查和检讨。

之前，他的保护神是陶铸。

陶铸主政广东长达十五年之久，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一直较为宽容。在陶铸的保护下，陈寅恪比那些北京的知识分子们，日子要好过很多。“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1年，吴宓来看陈寅恪，发现“鸡鱼等佳肴甚丰”。这归功于陶铸的指示：“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对于陈寅恪的优待，让许多人感到不解甚至于不满。一个中右知识分子、整天研究才子佳人，凭什么要受到优待？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借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的机会，反映了这种“群情”，认为对陈寅恪的照顾太过分了，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太特殊。

陶铸听后回答：“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1966年5月，陶铸从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中央，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除了毛泽东、林彪之外，仅次于周恩来，是党内“第四号人物”。

1966年7月，中山大学针对陈寅恪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了。奇怪的是，第一批大字报并不是出自历史系，而是出自学校后勤部门。贴大字报的人强烈谴责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多年来大肆挥霍国家的财富，每月要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照顾，最典型的说法是：这瞎老头什么不用干，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陈寅恪不得不和妻子就这些大字报做出说明，1966年7月30日，他致信中大保健室主任梁绮诚，用不再使用公费医疗来抗争，以证自身清白：“从1966年8月1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盐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斟酌收费。”

远在北京的陶铸曾经给广东省委打电话，其中谈到陈寅恪，“对他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这是陶铸一生中关于陈寅恪问题的最后一个指示。

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公开点名打倒了。远在广州的陈寅恪，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各路造反派纷纷上门，要求陈寅恪交代他和陶铸之间的“黑关系”。和他交好的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因为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受到专案审查，1967年2月死于心脏病突发。“造反派”坚持说陈是畏罪自杀，他暂存在中山大学的三千多册珍贵书籍被学校后勤部分当做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卖得款项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陈寅恪被迫交代自己和陈序经的关系，于是，有这样的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交代。每一个字都是这个盲老头的铮铮硬骨。

大字报很快把陈寅恪淹没了，目击者说，批评陈寅恪的大字报，贴满了他所住的东南区一号的楼房，白纸黑字的大字报让原本红色砖墙的楼房显得阴森恐怖，每有风吹，犹如片片白幡在招魂。有一段时期，大字报甚至贴到了屋里，贴到了陈寅恪的床头。

来自历史系的第一批抄家者上门了，收获特别丰富：陈寅恪的书籍、手稿、真心二十多封祖父陈宝箴的来往信札，妻子唐筼先祖遗留的金银首饰……都被抄走。

有人说，比起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遭受的拳打脚踢，陈寅恪并没有受太多的毒打。

真正的实情是，代替他被打的，是夫人唐筼。

## 二

陈寅恪和唐筼是典型的大龄单身未婚青年的结合。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初到清华，因无家室，学校便安排他住在工字厅单身宿舍。但是陈寅恪嫌其冷清，不愿住，他住到了同事赵元任的家中，吃饭也在赵家搭伙。

单身汉陈寅恪实在太聪明了，他在哈佛留学时就念念不忘“醉香楼的大龙虾”，回到清华，住在素有“厨神”之称的赵元任太太杨步伟家里，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安排吗？所以，对于蹭吃蹭住的生活，他非常满意：“我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

但老是这样，也太没有眼力劲了。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杨步伟：“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

陈寅恪回答：“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大些麻烦来了。”

赵元任听了大笑说：“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

杨步伟是热心人，做媒的事情，说干就干。她看中了清华体育教师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唐女士出身书香门第，和陈寅恪门当户对。杨步伟就鼓动陈寅恪去找唐女士聊天，每次一聊就是半日。有一次，陈寅恪回来，对杨步伟说：“我今天和唐女士大谈了半天，现在真是精疲力尽了。”杨步伟回答：“还未到真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就精疲力尽了。”

对于陈寅恪的晚婚，一直以来的说法是，陈潜心学业，加之认为自己体弱多病，恐累及他人。不过，我觉得，陈先生是有轻微恐婚症状的。1919年在哈佛大学，陈寅恪曾对好友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结为夫妇不过是第四等爱情，所以可有可无，并不令人期待。不过，这时陈寅恪的母亲俞氏去世，父亲陈三立一再催促他成婚，唐女士门第相当，又聊得来，也该结婚了。1928年7月15日，陈寅恪和唐筼借赵元任的家，举行了简单朴素的订婚仪式。

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

婚后，立志做学问的陈寅恪把全部生命燃于学问，所有家务都交给了其实也不识柴米油盐的妻子唐筼。唐筼学着下厨、养花、种菜、育儿，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她的聪明才智，都用来照顾丈夫。

陈寅恪喜欢吃面包，唐筼就自制烤面包架；陈寅恪体弱，需要喝牛奶和羊奶，唐筼买来一只刚生产的黑山羊，每天早晨，先把母羊拴在柱子上，洗净母羊乳头，半蹲下来，把碗固定在地上，然后俯身用双手轻柔地挤压羊乳，挤满一碗羊奶，她已头昏目眩。

抗战后期，因用眼过度，陈寅恪视力日益衰退，视网膜脱落，壮年目盲。唐筼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并承揽家中书信的回复。陈寅恪的许多诗篇都是她一笔一画笔录下来的。

但谁也不知道，这个陈寅恪依赖的妻子，其实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孱弱得如风中的芦苇。

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根据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的回忆，当时清华女生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等为主题，采访一些师母。唐筼的回答是实：“妇女为家庭作出贡献也很重要……”据说，当场立刻有伶牙俐齿的采访女生批驳，理由义正辞严：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岂可将人生的价值完全安放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而依然沿袭着旧时代旧女性依附男性的人生模式？

唐筼的人生，在清华新女性的价值世界中完全经不起推敲，只有唐筼自己觉得，这是值得的，她仰慕他，她愿将自己芦苇一般瘦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他。

### 三

陈寅恪和唐筼，只在一件事情上起过争执。1949年，傅斯年要陈寅恪夫妇赶紧离开，出走台湾。唐筼要走，陈寅恪不走。文革时，陈寅恪曾经交待了自己当年的想法：“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1955年七夕，陈唐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向夫人表明了没有出走的悔意，赋诗曰：

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留下来的陈寅恪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他尤为不明白的，便是“反动”二字。问了助手黄萱，没有得到答案，于是又问护士朱佩贞。这个不识字的广东台山妇女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回应。因为陈寅恪断腿之后只能卧床，需要几个小时翻身一次，朱佩贞的翻身技术好，能让陈翻身的时候感觉不到疼痛。所以，有一次，朱正在为陈翻身，忽然灵光一闪，说：“你每次都问什么是‘反动’，这就是‘反动’。”在粤语某些语境里，“反动”和“翻转过来”的意思相同。陈寅恪听了大笑，说：“那你这样做，就是‘反动’了？”朱佩贞回答：“是我帮你‘反动’，而不是我反动。”

这成了陈寅恪生命中最后三年里难得的笑话，之后每次翻身，他和妻子唐筼、护士朱佩贞都要为此大笑一场。

因为生活里可笑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他们所居住的东南区1号2楼，修建在康乐园中心地带办公楼对面。文革开始不久，造反派就在楼外安装了高音喇叭，声音极其恐怖，从早到晚播个不停。外语系教授梁宗岱的夫

人甘少苏说：“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

中山大学对于这位“反动学术权威”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到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去吧！（中山大学1969年档案）

1967年，因为上门的“造反派”太多，唐筼心脏病发作，陈寅恪为夫人提前写下了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在晚年，这对夫妇一直讨论自己的生死，他们都认为，唐筼会比陈寅恪先走一步。自从陈寅恪失明之后，唐筼都是他的代言人，而在1968年，陈寅恪却代替妻子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

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

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稽查，申请拶指保留一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

这份申请书，大约是陈寅恪写出的最没有文采的文章，然而，也是最深情的文章。这时，他不知道是否会对自己的“第四类爱情”做出新的注解。

#### 四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之前，他们被迫腾出一半的面积，让组织安插进的另一户人家与他们同住。这一次，组织又安排他们搬走，理由是，“工宣队”要征用这座楼房用作指挥部。

这一举动，无疑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

搬家时的情景是寒怆的，自文革被抄家后，家中稍微值钱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床、桌子、椅子、凳子等几件简单的家具。陈寅恪平躺在板车上，流着眼泪由人，把他拉到度过最后几个月的房间。

路上行人见此惨状，无不摇头叹息。

1969年3月开始，唐筼被迫参加校内家属组织的学习班，一直学习到7月才结束。学习班规定，学习时间不准请假。她去学习时，陈寅恪只得成天躺在床上。由于无人照顾，不必说无法翻身，就是想喝口水或想上趟厕所，都非常困难。

陈寅恪很少说话，有知情的中大老人说：“陈寅老好惨咯，坐不起来，说话都没有气力，一天到晚都在流泪。”

即使唐筼在家的时候，弄流食给他吃，但无休止的折磨已使他毫无食欲，每顿只吃几小口就吃不下去了。即使勉强吃下的食物，也因终日没有活动，消化不了。

然而，专案组仍不放过他，5月5日下午，专案组人员强迫他作口头交代，一直把他折磨到再也说不出话来，才勉强停下。

他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地对唐筼说：“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

根据专案组所整的材料，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于1969年2月21日到27日开会，讨论研究陈寅恪等一批专案对象定性和处理问题，对他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反动学术权威，戴帽，一批二养”。3月5日所草拟的另一份文件，对“反动学术权威”和“一批二养”作了界定：“对于旧知识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加以区别，……而像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们批得比狗屎还要臭，以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养起来做反面教员。”同年8月18日，校革委会常委会批准对他的最后定性结论和处理意见：“历史系陈寅恪，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一批二养。”

1969年10月初，他病重住进医院，10月7日早晨五点，一辈子守望中国文化，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又突发肠梗阻、肠麻痹，无法救治，凄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虚岁八十。

陈寅恪去世后的四十五天里，唐筼从容安排了陈寅恪的后事，她对从四川赶回来的大女儿说：“如果我死了，就不必再从四川来广州了。”

四十五天之后，11月21日晚8点，唐筼因脑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并发，抢救无效，平静地了断了自己七十一年的人生。

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亦为陈寅恪而死。

□ 本文主要参考：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九）

• 吴中杰 •

（上接1911a）

▲ 在台上看戏

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审问会不知开了多少次，战报、通令不知发了多少个，他们所要的材料大概逼取、骗取得差不多了，总攻就要开始了。

总攻的信号是高音喇叭播送出的最后通牒。

本来，每天晚上8时至8时半的新闻联播节目结束后，复旦广播电台也就息喙了。但这天晚上快10点钟了，突然响起以“哒，哒，哒，嘟——”开头的特殊音乐声，这是一支十分刺耳的乐曲，专门用来作为对“胡守钧小集团”发布通令、战报的前奏曲，一听就令人揪心。奇怪，何以在深夜播送通令呢？原来是下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说：经过广大军、工宣队员和革命师生几个星期以来的艰苦奋斗，战果累累，反革命小集团的许多成员迫于形势，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是有一些顽固分子负隅顽抗，另有一些人吞吞吐吐，讲一些留一些。我们警告“胡守钧小集团”和其他反革命小集团的人们，顽抗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耐性是有限度的。现在向你们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你们在今晚12时以前，将罪行统统交代出来。现在交代，为时虽晚，但仍予以从宽处理，这时不交代，则必将严惩不贷！

虽然那位训练有素的播音员将最后通牒读得声色俱厉，颇有威慑力量。但只有使我厌恶，而并不感到恐惧。反正我自知无罪，因此也并不惶急，看你们怎么办吧。这天晚上，照例在10点钟上床睡觉。因为按隔离室规矩，晚上10时可以睡觉，早上6时必须起床，中午不能睡午觉。我必须改变熬夜的习惯，否则，睡眠不足，昏昏沉沉，就无法应付频繁的批斗和逼供。

但是，我刚入睡，就被乱哄哄的一群人闹醒。

“起来，起来！你还睡得着觉！”

我睁开眼一看，工宣队的袁瑞云、庄明玉、刘家国和军宣队的莫某人都站在我的床前，怒目而视。我只好重新穿衣下床，聆听训示。

“刚才播送的通令，你听清楚了没有？”在这种场合，照例是袁瑞云先开口。并不是因为他职务最高，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最重要。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你还睡觉！这是什么态度？”

“隔离室的规定是10点钟睡觉，我并没有违反规定。”

“我跟你说的不是隔离室的规定，而是“一打三反”运动指挥部的通令。你不要耍花腔，通令里说的拒不交代的顽固派，你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等待是有限度的，今晚12点钟以前，你必须把你的罪行统统交代出来，否则就要从严处理了。像你这样的罪犯，要不争取从宽处理，休想保住老命！”

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训斥了一通，很快地就一拥而出，因为要留给我写交代的时间。

我只好在逼人的寒气中枯坐，挖空心思写几条与胡守钧等人交往的材料。虽然明知专案组看后又要斥我为避重就轻，只交代鸡毛蒜皮之事，但在这种场合下，什么都不写就是有意对抗通令，更是不行的。

以前我喜欢开夜车读书写作，12点钟以前是从不睡觉的，开通宵也是常事，那是一种乐趣。现在要我熬夜来写这种东西，实在感到很痛苦。夜显得特别的长，也特别的冷。

好容易熬到12点钟，期限已到，可以睡觉了，却不料又来了一个补充通告，说：审查对象们听到通令后，纷纷写交代材料，争取从宽处理，但因为问题太多，12时以前来不及写完，他们要求延长期限。经“一打三反”运动领导小组研究，允许延长到明天早上6时，云云。这一下子我又不能马上睡觉了。总得应付一下，再熬一会。到得1点多钟，我实在不愿意再奉陪不去了，冒着再次挨训的危险，悄悄上床睡觉。老天保佑，这次没有再把我拖起来，总算睡了几个钟头。第二天早上起来，头脑有点昏昏沉沉，高音喇叭里又在播送“通令”了，说是特别照顾，交代问题的期限再延长半天。然而这样一来，却漏了底：原来虚张声势的限时交代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只好一延再延，强制变成了期待、乞求。

经过几个星期的反复折腾，我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虽然在表面上我一直保持沉着、镇静，但内心里总是感到愤怒和忧虑，再加上饮食不调，老胃病又发作了。开始是腹胀沉闷，日数遗失，继而浑身乏力，体有低热。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称病躺倒。看守民兵与专案组联系，请了保健科的医生来诊视，医生检查了一通之后，说要化验大便。我这才注意到，我的大便发黑，如柏油状。这是胃出血的典型症状，内行人是一看便知。但那时我是第一次胃出血，毫无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懵然无知。医生大概是不好跟我讲明病情，只说要卧床休息，每天来给我打针。专案组则不肯对我讲明病情，只是批斗会上允许我坐下，说是政治上从严，生活上照顾，这叫做体现党的政策。胃出血病人本应吃流质的，我相信医生一定有所关照。但民兵每顿给我吃的仍是从学生食堂拿来的硬饭、冷菜。开始我还能吃一点，后来胃里实在无法接受了。那时我很想有一碗煮得烂烂的面条吃，也记起做学生时有病是可以吃病号饭的，于是就冒昧地提出了要求。结果是遭到一顿训斥，说身为罪人，还提出非分的要求，这是不老实的表现。送来的仍是硬饭，我无法吃，只好不吃了。大概专案组怕我饿死，他们负不了责任，只好同意给我买点饼干，让我泡在开水里吃。

那年春天天气特别的冷，而我带的衣服却很少，因为还是下乡劳动的行头，棉袄被头都是旧的，家里又没有人送寒衣，只好就这么打熬着。胃喜暖而畏寒，生胃病的人是挨不起冻的，一冻就更要加重病症。但那时却根本无法顾到这些。于是黑便不断，也即出血不止。

专案组只让我休息了几天，就又迫不及待地来逼供了，说是有什么重要罪行，胡守钧都已交代，而我还不肯说出来。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与胡守钧有什么勾结，当然无从交代。于是又受到轮番的进攻。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在胃出血未愈时就迫不及待地来逼供。是乘我病重体弱来进行心理战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直到全市批斗大会时，我才恍然大悟。

这种全市性的批斗大会接连开了两次，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前所未有。据说与会者有40万人之多。主会场设在江湾体育馆，外面有许多分会场，而且还有电视实况转播。“四人帮”在上海的头目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朱永嘉和林彪集团驻沪总管王维国等人坐在主席台上。我是被拉上台批斗的人物之一，所以很受注意。“四人帮”垮台以后，很多陌生人都说认识我，新入学的学生们也说早已知道我的大名，就得归功于这两次批斗大会，当然还有那些大字报以及印发了数十万册的批判小册子的作用。有一次我在丁景唐先生家碰到电影演员曹雷，老丁为我们作介绍，曹雷很风趣地说：“不用介绍，我早就认识他。”于是转向我说：“那个时候你比我们演员还出风头，我们都登不了舞台、上不了银幕，你不但登上全市注目的舞台，而且还电视转播，在上海简直是家喻户晓。”



这自然是后话。在当时，大家都没有这么轻松，也风趣不起来。风趣和幽默一样，是要有一定的环境和心境的。

在江湾体育馆开的第一次批斗大会，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午饭开得特别早，广播喇叭里不断地催促学生们赶快吃饭，准时集合，我知道，今天要开大型批斗会了。午饭后，只听见外面整队出发声，喊口号唱歌声，颇为热闹。隔不多久，队伍似乎走完了，校园复归于沉寂。这时，隔离室的门打开了，军宣队员和工宣队员一左一右将我押了出去。十号楼门口停着一辆军用小吉普，他们将我押上车，就风驰电掣般开走了。这副架势，有似押赴刑场。但我并不在乎。在别人看来，我显得很从容，其实我是相当麻木。如果要问我当时的感想，我可以老实奉告：我想起了阿Q。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阿Q，于是也就有了阿Q式的思想：仿佛人生天地间，有些人有时是难免要被关起来，有时难免要被拉出去批斗的。于是，对此时的处境，也就释然了。

没有多久，就到达目的地。下车一看，是江湾体育馆。这地方我来看过球赛，是熟悉的。旁边停着一辆大客车，“胡守钧小集团”的成员们一个个在专案组的押解下走下车来。我想，等级制度真森严，连对罪犯也讲级别。看来，不但做官要做大官，就是做反革命也要做得大一点才好。这是老实话。后来听说有许多小案子的审查对象，都挨饿挨打，甚至被关进水牢，而我们几个人，则因为要做样板示众，所以倒未受皮肉之苦。会议开始时，司仪高叫：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为首分子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和他们的狗头军师吴中杰押上来。于是我们分别从后台的不同房间被押到主席台前。因为是体育馆的格局，所以群众坐在阶梯上，而我们则立在谷地里。第一个节目是“犯人示众”，主持会议的张扣发要我们四个人抬起头来，由他加以介绍。对我的介绍辞是：这个人就是嘴上长胡子，额头有皱纹的藏在幕后操纵的狗头军师吴中杰。这时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多次提出要取保险刀来刮胡子，都遭到拒绝，原来他们要我扮演嘴上长胡子的角色，所以非要我留须不可。其实此时我只有34岁，并不算老，用现在的年龄标准来衡量，还远未超出青年的界限。大概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老家伙来担任这个长胡子的角色，所以就要我来反串了。好，我倒要看看这出戏如何演下去。所不同的是，别人是在台下看戏，我今天则是在台上看戏，既当演员，又当观众。

就演出而论，这台戏应该说是导演得相当出色的。每个批判者都激昂慷慨，义愤填膺，全场口号此起彼伏，声震屋宇。在发言的过程中穿插着许多提问，而那些野性难驯的猴子们竟被驯兽员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每问必答，有时还争着交代，竞相揭发。除了王志惠仍不买账，顶了一下，使演出的场面略显尴尬之外，整个演出过程是相当顺利的。最使我惊讶的是王华的反戈。王华是胡守钧的女朋友，与胡关系最近，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最多。每次批判胡守钧时，当事者都想从她这里打开缺口，把她当材料袋使用，但是她对胡守钧十分崇拜，忠心耿耿，每次都坚决地顶了回去。她坚信胡守钧是正确的，反对别人对胡守钧的政治迫害。但这次不知怎么搞的，竟被运动的声势压倒了，她也起来揭发胡守钧，并且自己承认是变成美女的白骨精，这使人感到，胡守钧的防线已全面崩溃，他彻底失败了。

不过，导演技巧弥补不了剧本的缺陷。就内容而言，这出戏编造的痕迹太明显了。为了证明这是一帮反革命集团，首先要把胡守钧打扮成一个反对毛泽东，并且要取而代之的野心家。当场抛出了几条惊人的材料：

一是从胡守钧日记中摘出的一首诗：“世人称君孔明灯，汝能将事照分明？劝君知趣快让位，当今毛著‘孔明灯’。”批判者的解释是胡守钧污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能“将事照分明”，叫嚣要毛主席“知趣让位”。

二是胡守钧日记上的一幅画：一把滴着血的宝剑，上面的题词是：“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我乃不能为是！”又写着：“宝剑作证人。”批判者认为，这证明胡守钧要杀人了，说：“这个反革命野心家妄图双手沾满鲜血爬到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头上，取伟大领袖的地位而代之。”

三是胡守钧游黄山时拍的一张照片：他手扶司的克，一只脚踏在一块圆石上。批判者说这是野心家的写照：胡守钧想学拿破仑和希特勒，要把整个地球踩在自己的脚下。据解释，圆石象征着地球。

此外还有一些辅助材料。

就根据这些材料，胡守钧的反革命野心家的罪名被确定了。既然为首分子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野心家，那么这伙人当然就是反革命集团了。对于他们的言行，都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于是，锻炼周纳，无奇不有。

但是，只要冷静地分析一下，立即就可推翻批判者的结论。胡守钧分明是要孔明灯让位，认为“毛著”是当今的孔明灯，那是在学习“毛著”热潮中的一种崇拜语言，怎么能解释成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取毛泽东而代之呢？而“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我乃不能为是！”引的是韩愈的话，无非是说：“别人是人，我也是人，别人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做到”的意思，而宝剑作证人，则如古人悬梁刺股用以警策自己。至于把旅游照片上的圆石解作地球，脚踩石头引申为称霸全球，只能说是批判者的想像力实在太丰富了。以想像和曲解来代替证据，还有什么法律和公理可言呢？真是可怕极了。

我正在这么想得出神的时候，突然点到我的名了。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女中学生揭发胡守钧在1967年5月中旬指使她去整理江青的材料，胡守钧承认有这事，但说是我指使他的。批斗会主席张扣发要我到喇叭筒前面回答这个问题，并且限定，只要回答“有”或“没有”，不能多讲。我很干脆地回答：“没有！”张扣发叫胡守钧揭发。胡守钧说我在1967年5月初曾对他讲，在北京时听金冲及说过，中央文革小组有两派，保张春桥的特急电报是江青发的。而他则是根据我所提供的情况，叫下面人准备炮打江青材料的。胡守钧一说完，张扣发就大声道：“吴中杰，在后面摇鹅毛扇的就是你这个长胡子的人，你还想抵赖吗？”胡守钧会当面编造这样的材料，确实大出我意料之外，张扣发又不许我详细辩解，我只好简短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愿意会后当面对质！”于是一阵口号声，就把我的话给压下去了。

既然把我拉上台去批斗，要我扮演军师的角色，当然得加上相应的罪状才行。如果批斗会全部揭发材料都与我无关，那么我就成为多余的角色，岂非说明编导者的失败？但是，抛出这样的材料实在并不高明。虽然我猝不及防又不能从容辩解，但在我否认之后，胡守钧也无法证实此事，而会议主席又只准我回答“有”或“没有”，不准我说明事实真相，至少可以表明，关于我的这条唯一的材料，是未经证实的，所以才会这么故弄玄虚，那么，我的罪名又怎能确定呢？

散会之后，仍用小吉普把我押送回隔离室。但不容我休息一下，就拥进了一大帮人，以袁瑞云为首，要逼我招供。我这才悟到，前几天刘家国弄神做鬼，说我有什么重要材料没有交代，又启发说是我指使胡守钧干什么事，胡守钧已经交代云云，原来闷葫芦里卖的是这味药。现在既已打开葫芦盖，他们当然要不客气地逼供了。但无中生有的事，我是绝对不肯承认的。

在耐心地听完了袁瑞云、刘家国的动员谈话之后，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我无从交代。”

袁瑞云说：“你不要把门关得那么死。只要你老实交代，还可以从宽处理，如果一味顽抗，你该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问题的严重性我当然清楚，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讲过的话，我怎么能承认呢？”

“谁叫你不实事求是？你这是攻击我们搞逼供信，你想翻天吗？态度太嚣张了。老实说，胡守钧都承认了，不怕你不承认。”袁瑞云以连长之尊，吃不住这样的顶，竟然恼羞成怒起来。

“我怎敢说你们搞逼供信，我只是说我自己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做过的事，别人再说也不能成立的。”我仍旧不软不硬地顶上一句。

还是刘家国聪明，他见硬的不行，赶快来软的：“也许你当时并不是有意识煽动炮打江青同志，只是胡守钧听了你讲的消息之后，起了炮打之心。我们也知道，他布置手下人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的事与你无关，你只要交代北京回来之后怎样将金冲及讲的消息通给他就行了。”

这显然是以退为进，先把大事化小，待套出口供，然后再上纲上线。

看来，非得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根本没有跟胡守钧说过那个消息不可，否则是无法逃脱煽动整江青黑材料之罪名的。

本来，这种两人私下的对话，要证明确有其事难，要反证没有其事也不容易。从法律的观点看，他们如拿不出旁证材料来，这一罪名就根本不能成立，但目前的情况却是，如果我拿不出否定的证据，他们就要认定确有其事，至少还要逼供不休。我处于不利的地位。我自己心里很明白，胡守钧说的是假话，但要证明是他说假话却并不容易。我隐隐然觉得胡守钧编造的假话是有漏洞的，但要举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却又难以措手。

在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了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之事。当年鲁迅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被举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章士钊说他有意抗拒教育部行政，呈请段祺瑞执政将他免职；鲁迅却抓住章士钊呈文的时间错误，即章士钊呈请免去鲁迅职务在前，而鲁迅被举为委员在后，从而向平政院提出控诉，结果是打赢了官司。是的，时间差，胡守钧的谎言犯了时间差的错误。我虽然不能指望以此打赢官司，但至少总可以有力地否定掉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吧。于是我提出了我的驳辞：

“那个中学生说，胡守钧是5月中旬布置他整江青材料的，胡守钧说我是5月初告诉我，我在北京听到金冲及如何如何说，他才决定整江青材料的，是这样吗？”

“是的。可见得你还是记得很清楚的。老老实实交代出来，就可以争取主动。你应该主动揭发胡守钧，不要等他来揭发你。主动和被动是不一样的。”刘家国以为有门了，赶快加紧宣传攻势。

“但是，胡守钧说的是假话。因为我是1967年5月中旬到北京，5月底才回上海。我不可能在5月初还未到北京去之前，就告诉胡守钧，说金冲及在北京对我如何如何说。”

我这么一说，袁瑞云、刘家国们都呆了一下。他们满以为抓住了把柄，打开了缺口，却不料我提出了这样的驳辞。但他们仍不死心，袁瑞云把脸一板，说：

“你不要在时间上要花腔，你老实交代，你当时对胡守钧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后面还有什么人指使你。你不要怕，老实说，你们都不不过是在前面打冲锋的，我们现在是要挖出你们后面的人，上面的人。你能交代出后面的指使人，就可将功赎罪。”

我很想反驳他这毫无逻辑性的混乱语言，但是不能。一反驳就是态度不好，即使问题搞清楚了，也落得一个对抗审查的罪名。所以我避开他的问话，还是紧抓住时间差问题做文章。这是过硬的证据。

“我并不是狡辩，你们要我提出反驳的证据，所以我排了一下时间表，说明我不可能在未去北京之前，预先告诉他我在北京的见闻。”

“时间隔了好几年了，你的记忆就那么准确？不要太自信了吧！你不要老是想如何抵赖狡辩，而要多想想如何交代罪行。”还是刘家国头脑灵一点，他知道要想绕开时间差问题来压倒我是不可能的。他换了一个方式，要在时间差问题上搞乱我的思维。

但我有恃无恐，进一步摊出了证据：“胡守钧提出的我告诉他北京消息的时间，有别人揭发他5月中旬指使人整材料的时间限制，不可能推迟到5月中旬之后，而我说的我于5月中旬到北京，5月底回上海的时间，你们可到财务科去查我报销的火车票，才两三年时间，他们一定还保留着票据的。”

这一下，工宣队无可再进逼了。但袁瑞云仍不死心，他说：“你敢保证？我们当然会去查的，这不用你说。如果查出来不是你所说的时间，你该当何罪！”这简直是要无赖了。

“如果查下来证明是我说谎，那么我甘愿砍头！”话讲到这个地步，我的态度也变得强硬了。不过，我还是不敢说出下半截话，即：“如果查下来，我是对的，那么你们该如何处罚？”

袁瑞云果真拿出纸头来要我立军令状。这又是在演戏。我国古代戏曲小说里不是常有立军令状之事吗？现在就搬到生活中来了。于是我也就模仿小说中的笔调，立下了一张军令状，颇有些玩弄的性质。袁瑞云却一本正经地将它收去了。

立过军令状，就出现冷场。因为实在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谈了。

停了一会，刘家国说：“当然，胡守钧的话我们也不是完全相信的，这件事等我们查了再说。但是你不要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你要认真考虑问题，老实交代。你的罪行是很多的。”

我知道，这是他们给自己铺的台阶，是这次谈话的结束仪式，有如旧上海白相人与人打架，虽然打输了，临走时总要丢下一句“后会有期”或“等着看颜色吧”这类表面带威胁性而其实并无实际内容的套话。

此后，就不再提起这件事了。他们一定已到财务科查过报销车票，证明我所提供的时间表是对的，此事就追不下去了。我知道，他们做错事是决不会认错的，搞错了问题也不会有个明确的交代。不再追下去，就说明是我对了。

过了若干天之后，又在江湾体育馆召开了第二次批斗大会，规模与前次相同。大概鉴于上次的教训，这一次不再涉及到我了。

这次会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主管上海日常工作的市革会副主任王洪文的一句话。他宣布的政策是：“罪行不论大小，关键在于态度。”这很令我吃惊。我虽然不是法学家，但按常情推论，量刑的根据首先应该是罪行的大小，其次才是态度的好坏。如果按照王洪文所说的政策处理，那么，态度不好的小偷或者根本无罪之人就要比认罪态度较好的杀人犯判得更重了。何况，他们所谓的态度好坏，也不取决于是否实事求是，而是指是否听话，是否按专案组所定的调子交代问题，如果对不符合事实的揭发材料有所申辩、反驳，就被认为不老实，态度恶劣。如此看来，王洪文所宣布的这条政策，是要引诱审查对象顺着领导意图来编造自己的罪行，罪行编造得愈多愈重就愈是态度好，而只要“态度好”，就可以从宽处理了。

呜呼，这是什么样的政策，这是什么样的法律啊！

好在两次批斗会之后，整“胡守钧小集团”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专案组和军、工宣队也不大再来向我逼供了。看守隔离室的民兵请来了理发师，给我们这些囚徒理发，同时还给我刮了胡子。我想，这是因为我已登台扮演过了“幕后长胡子的角色”，现在可以卸装了。真是“人生大戏场”啊，这些人简直是做戏的虚无党！

此后每隔一个星期我即提出要刮一次胡子，他们不再禁止，而爽快地从我“代存”的背包中拿出保险刀来让我用。只是每次刮胡子时都有人在旁边监视着，待我刮好胡子，他们仍把保险刀收走。这是怕我自杀。

这其实是多虑的。我干嘛要自杀呢？

用自杀来抗议吗？这需要当权者有民主意识和人权观念才行。现在他们视民如草芥，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不但不会引起震惊，反而别有一番风凉话：某某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因绝望而自杀吗？当时我虽然并不存在什么希望，但也并不感到绝望。夜虽长，但总有天亮的时候，俗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的变迁是很难逆料的，决不会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揆之历史，愈是镇压得疯狂的统治者，倒台得愈快。我总比你张春桥年轻，既然我已看出大家都在登台演戏，就要看看这出戏的结局，看看你张春桥如何下场。

但是，民兵的提防也不是毫无道理。在严峻的气氛中，在强大的压力下，确有一时想不开而自杀的人。高音喇叭中就警告过，某些人不要企图以自杀来对抗审查，自绝于人民；也有些人在忏悔书中检查到自己有自杀的念头；还有自杀而未遂者。

不久，关在我对面房间的吴卫国就愤而自杀了。

吴卫国是历史系“邹吴李反革命小集团”中的吴，是第二号人物。这个集团里的人都是党员干部，与张春桥手下的新贵、也是复旦历史系出身的朱永嘉有矛盾，朱永嘉为了清除权力上的障碍，就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了。吴卫国性格刚烈，被隔离后已自杀过一次了，我在隔离室走廊上见到他时，他的头上还包着纱布。但前几时在批斗大会上却一反常态，与李华兴在台上互相揭发，什么都承认下来。这大概使专案组和看守民兵很高兴，以为他态度转变，所以放松了警惕。在一天的早饭后，他出来洗碗时，乘看守人员不备，突然冲出十号楼大门，等到民兵追出去时，已经来不及了。吴卫国逃出隔离室时，我不知道，待民兵大喊大叫追赶出去时，我才注意到吴卫国逃走了。当时还以为他想学当年的周谷声，冲出隔离室，

由同伙接应出去。我想，今非昔比，现在全市总动员起来对付我们，派了那么多民兵看守，能逃得出去吗？还是静以待变吧。但不久，民兵们纷纷回来了，从他们的议论中，才知道吴卫国以极快的速度冲到旁边一幢楼上，从窗口跳下来自杀了。

这使我难过了许多天。我与吴卫国虽不相识，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现在关在一处，总算是难友了吧。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

吴卫国以自杀来抗议政治迫害，但并没有制止住“四人帮”的暴政。打击的范围愈来愈大了。

批斗了“胡守钧集团”、“邹吴李集团”、“反复辟学会”等等之后，接着就“乘胜追击”、“横扫一切”。高音喇叭虽然已不大广播这类案件了，——也许是全面开花，播不胜播，也许是规格较低，犯不着每案都播了，但我在隔离室中仍能感受得到。因为有些案件，仍与我有瓜葛。别的专案组到隔离室来对我提审了两次：一次是校机关干部被整，说我是他们的后台，要我承认。这是因为我曾主张解放干部之故。但我既非党员，又非干部，如何做他们的黑后台？真是太抬举我了！另一次是中文系许多教师被整，说他们是“小圈子”，对抗工宣队，也派定我当黑后台。我本人是中文系教师，与他们当然有联系，但并没有一起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何以又说我是黑后台呢？我想，大概我已被认定为扮演黑后台、黑谋士的专业户或特型演员了吧，否则，何以老找上我呢！

俗语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反正我已背了一身莫须有的罪名，再加上一两条罪状，当然也无所谓，但要我编造材料来害己害人，却办不到！我一条也不写，反正已被定为顽固派了。

这段时间，我的房间住进了另一个被隔离者。这很使我警惕。也许是暗探吧，莫非他们要用苦肉计来对付我这个反革命顽固派？所以当他偷偷地想与我谈几句话时，我也不大敢搭腔。后来从他断断续续的自述中，我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积极分子，会画几笔画，工宣队叫他写标语、画宣传画，不料有一次画毛主席像画得不好，被认为是丑化伟大领袖，就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他想不通，很痛苦。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底细，但从他终日无精打采、痛苦万状的样子看起来，似乎并非假装的。这个人慵倦到极点，甚至连吃过饭的碗都懒得洗，只伸出舌头舐一舐完事，第二顿照样盛饭吃。

我虽然很同情他，但却也不敢与他搭讪。这种人积极惯了，一受打击就惊恐、沮丧如此，只要能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难免会将他人出卖了的。但有人同住，即使观察观察这个人的懒劲，也可以解一解厌气。

过不久他就出去了，我又复归于寂寞。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 【广阔天地】

### “两个世界”的交叉（下）

• 叶维丽 • 马笑冬 •

（上接 z k 1 9 1 1 a）

叶：有意思的是，老乡好像不把我们女知青当做有性别的人。有时当着我们的面，他们就议论女知青怎么就不像女人，“形体”（这不是老乡的原话，是我的较为含蓄的“翻译”）不像，举止言谈不像，穿着打扮也不像。老乡们在地里干活时经常讲些男女之间的事，照他们的说法，晚上那么长时间不干这个干什么，还常说些很“荤”的笑话。他们从来不避我。最初听到这些话我觉得特别扭，后来明白我在不在场他们都这么讲，也就充耳不闻了。这些笑话给枯燥的田间劳动带来乐趣，它的听众主要是十五六岁的小后生，你甚至可以说是对他们进行的“性教育”。相比之下，我这样在清教主义影响下长大的人在性的问题上要无知多了。

我和男社员们一起干活从来都觉得很安全。我们刚去的头一两年，有个别老乡打听女知青有没有要在当地结婚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要彩礼钱，结果被男生严词驳回了。事后男生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说起来俨然是我们的保护者。我心里觉得好笑，并没有请你们代表我们。后来老乡就不打女知青的主意了，可能他们明白我们早晚得走，留不住。

村里人在性的问题上没有城里人那么多禁忌，有时会听说谁“偷人”了，谁和谁“相好”了。男女青年在一起打打闹闹，拉拉扯扯，有的女孩子在男人怀里乱滚，别人在旁边看着哈哈笑，大家都很开心。我想老乡们在男女关系上就是这样随便，慢慢也就见怪不怪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叙说。我们在那几年，我们村有一对男女双双被枪毙，我亲眼目睹行刑的全过程。女方是个30几岁的女人，有丈夫、孩子。男方是个大后生，20大几了，还没结婚。两个人“相好”了，女方撺掇男方给她丈夫食物里下砒霜，不久她丈夫中毒身亡。我们到村里时，他们两人已被逮捕。当时正兴“群众专政”，有一天老乡们被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议论该怎么判刑。压倒性的意见是给女方判死刑，放男方一马。据说女方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和不少男人睡过觉，有个很难听的外号。而男方是个“好受苦人”，因为穷，娶不起媳妇，是女方勾引他，教唆他犯罪。发表意见的都是男人，不知村里的女人们怎么看待这个案件。

后来法院的判决下来，两个人都是死刑，公审大会在离我们8里地的公社所在地召开。那天大队停工，全体社员都得去公社开会。公审的都是刑事犯，有六七个人，我看到了我们村那对男女，他们的罪名是“因奸杀人”。那个小伙子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他的嘴被勒上了绳子，不能发声，他用眼睛在人群中搜寻熟人，神情很镇定。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普通，没给我特别的印象。法官宣读完判决，大会立即结束。各村来的人很多，一时非常混乱。我正要往山河西方向走，突然看见押着犯人的卡车在我面前一块空场停了下来，犯人们被推下车，几声枪响，他们在离我仅几米之外的地方倒地身亡，全部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一口气还没喘上来，就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一些人拥将上来，将死人的脑浆收集起来，包好带走。这群人里我看见了七队一个社员。

在此之前我连死人都没见过，如今我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看到了似乎在蒙昧蛮荒的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此后的若干天，我几乎天天夜里做噩梦，血腥恐怖的场面挥之不去。

后来我听老乡说，用新鲜的人脑浆治疗毒疮是当地人相信的偏方，这个说法让我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人血馒头”。咱们中国人，不分南北，都有很“邪”的、用“现代”观点看十分野蛮残酷的治病办法。我们队那个社员长年累月长疮，让他不堪困扰，有时他会用很脏的布把长疮的部位包起来，让人看着就很难受。村里有两个半脱产的“赤脚医生”，他们会简单的针灸，备有一些常用的西药，还种着一块中草药地，但他们显然治不了那个社员的顽症。野蛮的办法不但和愚昧有关，也和无助有关。

公审大会过了很久，老乡们还在惋惜那个被枪毙的大后生，念叨他是个多么好的“受苦人”。

◇ “七尺灰”

叶：除了贫穷，我还感受到了干群矛盾，有时相当尖锐。我们村只要大小是个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好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好处，比如分东西的时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们那么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就很不一样。哪怕一些为人不错的干部都这样做，好像这是当干部理所应得的。老乡们心里不满，常发些牢骚，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7队的干群关系格外不好，社员们背地里管我们的队长叫“七尺灰”。“灰”在当地是“坏”的意思，这个人个子很高，“七尺灰”的意思是“高个子的坏蛋”。他很少下地干活，平时所谓上工就是拿把镰刀，到地里各处转悠，看看哪块地该锄了，过两天让社员去锄。他转一转就回村了，不知在哪个炕头坐着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就挣了一天工分，还是最高分，老乡管这种工叫“遛弯工”。

“七尺灰”偶尔下一次地，我们就要“受死”。

马：受死？

叶：我们那儿管干活叫“受苦”，“受死”就是让你拼命地干活。平常“七尺灰”不来的时候，是副队长领着干活。我们走到当天要干活的那块地，有时离村里好几里路远，副队长说“抽袋烟吧”，大伙就在地头坐下来，这一坐半天不起来，抽烟聊天磨时间。抽了几袋烟以后，副队长慢悠悠地站起来，大伙儿这才开始干活，中间还休息一下，等到快晌午就收工了。这样一种劳动态度，让我很早就明白社员们没有积极性。成年劳力还好一些，十六七岁的小后生们尤其不好好干。他们锄田的时候，地头锄锄，中间划拉划拉，就到了另一头，在地上坐着等大伙过来。

可“七尺灰”一来我们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时不干活，养足了劲儿，偶尔到地里来，还常常是我们干了半天他才到，一来就腰也不直地锄地，他腿长，大步流星，你还得跟上。到快晌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如果出早工的话，清早就开始干活了，早饭是担到地里吃的。我们知青的早饭还有干的，通常是一个玉菱窝窝，老乡就是稀薄的玉菱糊糊，里面能放几块山药就很不错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吃野菜团子。到了中午大伙儿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别的队都回家了，从我们地头经过时，“七尺灰”好像没看见，我们只好继续干。这时候我觉得太阳特别毒，地头特别长，肚子特别空。四周安静极了，只有我们7队社员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整我们一次。我们队的社员都恨死他了，背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大家都怕他。他虽然年纪也就是30多岁，可是辈分不低。他能这样为所欲为，在大队里一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们，我都气得浑身冒火，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反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句话就在嘴边，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来。作为知青，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队老乡。

马：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会不会因此压你，不许你回城，不让你上大学？

叶：我没想过。我想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可是我即使当面顶他，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他不会把我当回事儿。当然这样解释是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负疚是因为我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从小咱们受的教育是要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这么软弱。

我做了一阵大队“电磨”的会计，“电磨”就是粮食加工厂。大概因为前几任会计手脚不干净，大队就让知青去管账。我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开关机器，称粮食收钱，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粮食粉末，头发全是白的。在“电磨”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走后门”是怎么回事。常有干部、有时包括公社干部拿自家粮食来，放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人了。你给不给他们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钱？就算我不给他们加工，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乡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加工好了。有时快下班的时候几个干部一起来了，拿了粮食就走，没有二



话。很快我就明白，他们是不会给钱的。跟我关系好的老乡，有的也把粮食悄悄放下，跟我点点头就走了。

渐渐地，我学会了判断每一种情况，不在加工厂我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学问”。干部的钱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认账，但是大部分人的钱你必须得收，否则加工厂就没收入了。在哪儿划一道线呢？对大部分老乡朋友，我只能管他们要钱，要不然我这个营生没法干。只有高典老汉，我就不收钱了。他实在太困难了，因为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负担又重。每天下班后结账时点着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觉很复杂：我实际上是给干部们走后门做了同谋，又不能帮助队里那些也很困难的乡亲们。至于收入上缴之后大队是怎么花的，有没有贪污，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厂干了几个月我就不干了，又回到队里去锄田。

#### ◇ 无形的墙

叶：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小后生经常问我们：“你们在城里看电影吧？溜马路吗？”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们永不疲倦的话题。他们想象城里人吃饱饭了没事干，穿得干干净净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就是农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

“体面”，有闲。年纪大一些的老乡只是听，什么也不说，他们似乎已经不向往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小后生们想象的城市生活画面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锄着叶子已经开始刺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离我也很遥远了。

马：城乡差别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插队的人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农村会这样穷？

叶：我有好多疑惑：为什么老乡不热爱集体，反倒老想办法占集体的便宜，干活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为什么越干越穷？“受”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好？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那么大？我已经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是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去深想。当时听说有些爱思考问题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凑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地下沙龙”，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种子。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们村知青中没有这样的人。

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叶：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后来大家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个村里的人，他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女生脱口用雁北话说：“忘球啦？”（把我们忘了？）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后说：“净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欢这样一个组合，我那时已经十分不认同干部子弟那一套了。

马：那你怎么跟着这些人去了？

叶：是学校分的，除了一个“老初三”的，我和别人都不认识。下乡的高干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没问题的很多都去当兵了。我们村一开始去了20多个知青，后来陆续又有来

投亲靠友的，最多的时候有30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弟弟”。那时候一个家庭分散在几处太平常了，有的家长就尽可能让孩子们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好互相照应。我弟弟的学校是去晋南，我爸爸妈妈让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阵我们家5口人在3个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济的新华社“五七干校”，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北京。当时中国城市几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妈妈因为腿残废，没去干校，在北京给我们保住了个“窝”。我们村里有些同学在北京就没家了，还有的同学家长被关起来，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知。我们插队那几年，有个男生的父亲在干校突然死亡，至今闹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我爸爸在干校打井，几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这就是当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写照。由于我们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

因为尽是些落难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压抑和不满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没别的出路，只能插队，就来了。第一年年底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冬天地冻得硬梆梆，营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像候鸟一样。

村里干部不“左”，从来不找我们的麻烦，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内心很希望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伙做事的人，能够参与村里的事务，为老乡们做点儿事。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同学和老乡相处得那么融洽，参与屯子里的公共事务，她们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县别的一些村子里，知青有的当了队干部，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个村的知青在村里几乎“夺了权”，大队小队的干部都有他们，在老乡中威信很高。而在我们村，除了个别男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融进村里的生活，也无意进去。有一度我认真地想要转到“干事儿”的村子去，但最终也没走。一想起在黑龙江的同学，我就惭愧不已。我恨自己无力冲破那堵无形的墙，有时恨？浑身燥热，但就是冲不破。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墙”的存在。有一次两个知青要结婚，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关系。听说他们两人要在村里结婚，老乡们都很兴奋，觉得可以热闹红火一下了。结果没一个老乡被邀请，连村干部都没请，完全把门关上了，知青们自己开了一个聚会。我想老乡们一定很失望，他们还准备“听房”呢。那两个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村里一年多了，认识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决定不请老乡的。

马：有人提出异议吗？

叶：没有，我心里很不舒服，可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这些人里还有人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呢。“解放全人类”是四中老红卫兵组织，男生中有几个人曾经和这个组织有关系。他们在自己的锄头上刻着“解放全人类”，每天上工扛着这么个锄头，我觉得特可笑。

到村里后不久，知青就分为两派。这种派系之争特别无聊，而有人却把它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两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两派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分歧。我想是有个别男生权力意识特别强，习惯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就把它带到农村来了。两派都以男生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没参加。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外人”的感觉非常强，既不是老乡中的一员，也不满意某些知青的拉帮结派，成了“两个世界”之外的人，一个人很孤单。

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香肠之类凑在一起，再从老乡家买些豆腐、鸡蛋，做一顿好吃的解馋。我们平时的伙食干的是玉茭窝窝，稀的是玉茭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时放山药蛋。雁北地区蔬菜种得少，老乡很少吃鲜菜，一年到头吃用洋白菜丝和胡萝卜丝腌的酸菜，叫“烂腌菜”，我们也跟着那么吃。刚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总觉得有一股酸臭味。刚去的那年吃不饱，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门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剩下的。后来能吃饱了，但是没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过年，伙房吃羊肉饺子，有的人先吃一轮，然后到外面去走路“帮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轮、第三轮，没人把肠胃撑破了真是万幸。不知为什么，小米“养”女生，第二年以后女生都红润了一些，男生

还是又黑又瘦。但就是这样，我眼看着我弟弟的身体一点一点往上蹿，撑破了一双又一双从家里带来的袜子，补他的破袜子是我的事。

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菱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烧饼夹油条。其实在家时早饭也不吃这个，可能这种最普通的北京早点代表着一种已经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队让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教育，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咱们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农村的生活，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山西，让咱们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后来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动力，大概和我们每个人肚皮的感觉有关。

两派“打平伙”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在村里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和我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个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轮满月，想起李白的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到特别孤独。你提起在火车上过18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村里过20岁的生日。那天中午下班回来，我没有去大伙房吃饭。那时候我们知青还分散住在老乡家，我把弟弟叫我住的家，屋里有个连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几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风箱把水烧开，下了一把挂面打上两个鸡蛋，姐弟俩每人吃了碗鸡蛋挂面，算是给我过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机吃顿好的，心里没有什么感触，不伤感，也不想抒什么情，下午照常出工。

#### ◇ “歌唱动荡的青春”

叶：那几年在我们村知青中，发生了很多“爱情故事”，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插队的几年贯穿着一条“爱情红线”。一帮青年男女朝夕相处，身在两性文化相对开放的乡间，又没有家长的管束，有各种各样的“罗曼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村最后成全了5对知青夫妻，到现在他们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开玩笑说，上河西“宜婚”。当时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没被拴上爱情红线，而且因为我哪派也不是，这方面的消息往往最不灵通。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说知青之间有性关系时的震惊。

马：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我们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们7队的饲养房背靠背。一天我听队里老乡说在饲养房院子里发现了避孕套，说一定是“学生们”用完了顺手扔到墙这边来的。

马：老乡们居然知道是什么。

叶：就是啊，我就是看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听说以后一下子觉得乌云蔽日，天昏地暗，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3天。从来没有一件事给过我这么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么大的刺激都没让我这样。我至今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关心是谁，但一旦知道身边知青中有人这样做，我就想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对整个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反应。是“文革”中“性”变得极为肮脏吗？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乡之间的种种“故事”。

马：我不知该怎么帮你分析，但是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那样反应。“文革”中“性”变得不但肮脏，而且可耻。不过在我听来，你们插队的可真够开放的，我们在兵团要单纯得多。你说你在知青群体之外，这也让我难以想象。对我来说知青群体特别重要，我和几个知青朋友的友谊是我插队的最大收获之一。

叶：其实我又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我看不惯某些人的行为做派，但是在政治观点和文化趣味上又和村里的知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后来陆续有人去当兵或进工厂，知青人数少了，派系色彩淡化了，大家相处得比较融洽，我和有的女生成为终生好友。在性的问题上，我后来听到的多了，也不再大惊小怪了。村里的知青也不都是干部子弟，什么“成分”的都有，大家都“蹲底”了，在“一口锅”吃饭，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大大淡化。我们这代城市青年超越家庭出身的互相认同，是在广阔的农村形成的。

我不喜欢知青之间无聊的派系之争，但我们那儿比较“自由化”，政治上一点儿都不“左”，这是我喜欢。林彪事件出来后，大家都觉得出了一口气，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说话也随便了，有时会在一起骂江青、张春桥，因为知道彼此政治上看法相似，也不怕有人告密。后来上面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不但不纠“左”，反倒继续反右，大家议论起来都很不理解。陈毅去世，大家的心情一片沉重。这些“子弟”们对上层政治的变化很敏感，因为它和他们自己的命运密切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无论我如何觉得自己站在“外面”。

另外，我们那儿的学习气氛也很浓，这使我得益不少。

马：你们还能学习？学什么？

叶：有个同学带去他爸爸两大木箱的藏书，其中很多是经典名著，俄罗斯19世纪小说什么的。他父亲在1930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记者，因为去干校，北京没家了，只好让孩子把多年的藏书分散带走。除了这两大箱子书，知青之间还传看别的书，有时村与村之间互相交换。有一次从外村传来一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只允许我看一个晚上，我一夜没睡看完了。我们刚去的时候点油灯，晚上看书很费劲。后来一个男生帮助村里“拉”上了电，晚上就能看书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听过书。

马：听书？

叶：有个男生曾经一连好多天，每天晚上下工后讲《基督山恩仇记》。那时秋收快完了，活不太忙，下了工，吃了饭，大家就拿着马扎或是用粗麻绳盘成的坐墩到他屋里去，听他开讲。有一次我们队晚上打夜工，我收工回来从那个男生窗外经过，只见屋里坐了一圈人，那个男生绘声绘色地讲，大家都仰着头很专注地听。我突然觉得很感动。

我们村的男生大部分是四中高二的，女生是我们学校高二高三的，“文革”前都准备上大学了，教育水平在中学生中应该算是很高的。里面有几个四中的学习尖子，其中一个过去物理学得特别好，他下工回来总爱琢磨他的锄头，在火里烧来烧去，找最省力的角度。还有一个对国际事务特别感兴趣。我们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只要上面报道哪个国家，他就把有关这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物产、风俗等等都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逐渐积了很多册，简直成了他自编的世界知识手册，他不时拿出来向大家炫耀。

我刚去的时候有什么书看什么书，两年后在村里学习氛围的影响下，开始有些计划地自学。那时我已经习惯了田间劳动，下工后仍有剩余的精力。除了下工后晚上学，冬闲白天也学。当时大学还没有招生，谁也不知道以后还办不办大学，但这没有影响我们求知的欲望。我弟弟原来是初二的，他在村里学习氛围的影响下，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有个男生特别喜欢英文，带动得不少人都跟着学英文。

马：你们在乡下怎么学外语？

叶：看书，也跟着收音机学。我上学时学过3年，但当时英文不是主课，我也不太重视。开始自学后，我才意识到当年王老师给我们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我至今对她感激不尽。我们很多人都有半导体收音机，很早我们就开始收听“敌台”。我们那个地方很奇怪，

不用费劲去找，就可以收到美国之音、BBC、NHK、莫斯科广播电台，而且都挺清楚。有一次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山楂树》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们就像听到了仙乐一样。

马：听“敌台”可是犯法的事情。

叶：我们只是偷偷听，不敢让村里知道。不过即使村里知道了，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美国之音有一个节目叫 Special English，说得很慢，单词量限制在 2000 字左右，是给初学英语的人听的，有段时间讲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历史，每天讲一点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杰弗逊和汉弥尔顿之间的争论，讲杰弗逊自由和人权的观点。我在此之前对美国历史一无所知，听这个节目让我对杰弗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刚来美国学的是美国史，还专门到杰弗逊的家乡参观过，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想想看，在“文革”期间中国的穷乡僻壤，有个插队知青迷上了杰弗逊，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音乐非常重要，我不能想象没有音乐是什么样子。我们村同学爱唱一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叫《歌唱动荡的青春》。“动荡的青春”这几个字那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太喜欢这首歌了，把它称做我们的“村歌”。

马：我没听说过这首歌。

叶：它是不太出名，但词曲都很优美。我头一次听到是有个外村女生到我们村里来玩，她已经被招到地区文工团了，是去唱歌的。我们村的男生可能想“震”她一下，就一起唱《歌唱动荡的青春》，结果把我给震住了。其中有一句词是“就像每个青年一样，你也会遇到个姑娘”。那些男生——我弟弟也在里面——对着一个外面来的女生直着嗓门吼出来，有点公开调情的意思。我听得脸直发烧，心想他们怎么这么恬不知耻啊，结果这句歌词我记得最清楚。他们的歌声绕梁而行，余音久久不退——我们的屋子没有纸棚，大梁就露在外面。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男声合唱。

马：爱情的词就这么唱出来？真了不起。我们那些年就没唱过情歌。

叶：恰恰是歌唱爱情的歌曲最让我感动。当时在主流文化里爱情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在我们村知青的“小文化”里，爱情又回来了。我们有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都给翻烂了。除了外国民歌，我们也唱“文革”前的老歌。有一个女生爱唱《百灵鸟》，唱得特别甜，后来再听专业歌手唱这支歌，都觉得没她唱得好。

有一天晚上，一派人在院子里唱歌——那时派系还很明显。我们知青的院子在村南头，那天月光如水，他们唱到兴起，深更半夜也不停，把“二百首”里会唱的都唱遍了，一首接着一首，里面有大量的情歌，北美的，南美的，东南亚的，欧洲的。我们不唱的人在屋里听，大家听得如醉如痴，没有一个人说太晚了，别唱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月光音乐会。

马：听了你讲的，我真有点后悔当初没去插队，你们比我们在兵团自由多了。不过我觉得你们村跟我知道的大多数知青群体不一样，你们创造了一个小氛围。你们在思想、政治、文化和性各方面都挺解放，这是不是和你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叶：我想有关系，干部子弟比较“不吝”。1966年底在北京形成的、对主流政治文化唱反调的“亚文化”，就是以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为主体的。随着大家下乡插队，城市青少年的“亚文化”被带到农村来了。想起来很有意思，中国偏远的乡村给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各处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城市知青“部落”。现在文艺作品描写知青生活，不是写怎么“革命”，就是写一些人怎么偷鸡摸狗。其实当年的生活有各种形态，年轻人也总要想设法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当时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可钻的空子很多。

“文革”时代充满了悖论，一方面集权政治似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着大量“边缘地区”。我们在雁北就身处边缘，远离了政治中心。应该说，那时中国社会的活力在“边缘地带”。当然我们那样做，也因为我们处在青春躁动的年龄。

再进一步想，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我们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主义”教育重新“接轨”：读19世纪欧洲小说，唱外国民歌和“文革”前“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传统的“回归”。有一年夏天“挂锄”期间——我们那儿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挡叫挂锄：地里没什么活可干了，就等着庄稼的最后成熟——我和一个在雁北大同县插队的中学同学一起去找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同学玩。在那儿我们听说，内蒙古很多老乡家里都有手摇唱机和唱片，“文革”初期“破四旧”，并没有扫荡到这里。一天两个北京男知青在一个蒙古包听到了久违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下两个汉子不能自己，相拥痛哭失声。

我听了泪水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过后我想，为什么一支童真的歌曲，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剧烈的震荡？因为它唤醒了我们童年善良和美好记忆，抚摸了我们因为“文革”变得粗粝的心灵，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温情和伤感。用一个“老三届”的话讲，咱们这代人对《让我们荡起双桨》有恋母情结般的情感。其实严格地讲，这首歌最初是为比咱们大七八岁的人写的。它之所以成为咱们这代人的歌，是因为咱们和它有着“失而复得”、一言难尽的关系。

话又说回来，我们当时那么做也是“逃避现实”。读托尔斯泰、司汤达，听美国之音、BBC，唱拉丁美洲情歌，所有这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点儿“不搭界”，这样做是不是也表达了我们得不到的东西的向往？有一年夏天我们去离村里二三十里路的南山玩。一路上景色怡人，有个男生说：“咱们是澳大利亚旅游团。”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澳大利亚”远在天边，“旅游”是多么奇怪的概念！人有时候得在想象中生活一下，就像我们队的小后生想象城市里的生活一样。

1969年美国人成功登陆月球。这条消息和一幅小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一块不显眼的位置上。别人看完了报纸，随手扔在我睡觉的炕席上，我也拿起来看了看，当时没有特殊的感触。世界上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很多年后，我看了一部当年的纪录片，里面美国宇航局的地面工作人员欢喜若狂、相拥而泣的镜头也感动了我。这时我想起来，我那时正每天头顶太阳、背朝黄土在修理地球。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近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我会想到“苦难”。由于在农村那几年的生活，“苦难”的感觉变得真切，因为我自己也尝到了一点儿，虽然没有那么深，也没有那么久。如果我读到什么东西和这个题目有关，就能引起我深深的共鸣。没有插队那几年，我不会是今天的我，我的情感会很不一样。“人民”对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们是我曾经朝夕相处的乡亲。直到今天，提起上河西我会脱口而说“我们上河西”。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村子是“我的”，这使我感到我的双脚踩在大地上。我初到村子的时候18岁，离开时23岁。从年龄来讲，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上河西度过的。

一方面这样的经历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永远呆在农村，这就是矛盾。在村里的头两年，我眼见亲手种的幼苗长成庄稼，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悦：这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但后来年复一年，日出日落，重复同样的劳动，生命好像停滞了，浪漫的情怀逐渐消失，我在心里常常问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

在农村待的时间越长，我对学习的渴望就越强烈，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好像什么东西在心里烧，让我焦躁不安。1972年曾经有过一次上大学的机会，那时大学刚刚开始恢复招生，一位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来到村里，认真召开了两个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和知青会。两个会都推荐了我。我们队的老汉推荐我是看我干活“实诚”；知青们很实际，谁家问题解决了谁就走，我父亲那时已经“解放”了。我满心欢喜，终于又能上学了！没想到最后发通知的时候，别人的都来了，就是没有我的。

我风尘仆仆走了30多里路到县城去了解情况，没人告诉我是为什么，我只好专程回北京找北大的那个招生老师。他说：“是因为你的日记。”我一听完全蒙了，“我的日

记”？！后来才明白，“文革”时我父亲部门抄我们家，顺手拿走我的日记，我居然多年来毫无察觉。这本日记被我父亲的“专案组”做了一个“反动日记”的“结论”，跟着我来到山西，和我的档案一起放在公社办公室，在关键时刻“浮出水面”，成为我那年没能上成大学的原因。后来我父亲多次跟我说，若不是他在抄家前早已把最“尖端”的部分撕掉，我有可能因为这本日记而坐牢。

1973年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有中央文件说要清理档案中的“黑材料”，这本日记才被从档案里拿出来退还给了我。我拿在手里一看，它不知被多少陌生人翻阅过，上面有脏兮兮的手印，还有划的红线和夹的纸片。这本日记不光写着我在“文革”初期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还写着我在十三四岁少女时朦朦胧胧的感受。拿着这本日记我突然觉得它很脏，像一个久不见面的被人强暴了的老友，后来我觉得被强暴的就是我自己，我在心里用了“强奸”这个词。我请妈妈把它收起来，再也不想见到它。

日记的问题解决了，1973年夏天我又争取上大学，那一年我走成了。临走之前我去找村团支书，他是我们队的大后生，叫“布锁”。我说，布锁，我要入团。布锁给了我一张申请表，我填好了交给他，就算入团了。团组织平时没有任何活动，要不打听我都不知道老实巴交的布锁是书记。要回城了，我隐约觉得需要一张“团票”，后来我发现我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做法太有必要了。

这时候村里知青差不多都回城了，偌大的知青院冷冷清清，没有了往日的喧哗。我们一排10间屋子，开始的时候三四个人住一间，这时一个人住一间还绰绰有余。早几年我们在院子里种过菜、养过猪，这时院里长满了没膝的野草，一派荒芜。走的时候队里派了一辆大车送我到城里去坐火车，我一直冲着村子的方向坐着。我们村对面远远的有两座大山，一座叫馒头山，一座叫草垛山。老乡的解释是，“人有馒头，牲口有草垛”，多么实际。后来越走越远，看不见村子了，我就望着远方的山，心里在想这些年来什么都没为老乡做。我带着这种深深的歉疚离开了上河西。

当时没有想为什么我们知青能走，而老乡就得锁在土地上，没去想这其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城乡不平等。我在外村搞“一打三反”的那年冬天，认识了村里的小学教师。他是本村人，很聪慧，我们很谈得来，分别的时候两人都觉得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我感到一种很朦胧的东西，触到内心深处，我对村里那些“门当户对”的男知青没有那样动过心。后来他专程到北京看过我，那时他已经结婚了。我们的情谊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说到底，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中间隔着深深的鸿沟。

1990年代我曾两次回村。第一次是自己回去的，第二次是和几个同村知青一起回去的。高典老汉已经不在，高典老人得了中风，行动不便。第一次回去是搭便车，在村里待的时间很短。在短短的时间里，高典老人的孩子们七手八脚，端出了一桌有模有样的饭菜，有饺子，有熟肉，甚至还有啤酒，这在当年完全不可想象。高典老人家在村里属于中下等收入，看起来老乡们的生活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有的家庭甚至有了电冰箱和电视机。也见到了“老懂”，他已经从后生变成了老汉。他文绉绉地对我说，“你回到第二故乡了”，弄得我眼眶发热。问起来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我们生活在石器时代。”我听了有些惊讶：为什么老懂会这么说？要说“石器时代”，我们在的时候离那儿更近呀。后来我反复琢磨，是不是因为比较的参数变了：当年仅仅跟几里外的邻村比，现在打开电视一看，美国人、欧洲人过的什么日子！再看看自己，就成了“石器时代”。

又过了几年，我第二次回村。那次和别的知青一起在村里住了几天，发现村里变成了“动物世界”，满村跑的鸡、鸭、鹅和大牲畜，到处是它们的粪便和饮水的水塘，人没有下脚的地方。老乡致富的主要手段是养奶牛，8里外的山阴城建了个奶粉厂，生产“古城牌”奶粉，据说在北京都有卖的，厂里每天早上来人到村里收购鲜奶。富裕的人家养着七八头奶牛，他们住的房子高大宽敞。村里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东一处，西一处，似乎毫无规划。

原来村里还有个可以被称做“社区中心”的地方，在“吕祖庙”的附近，是一片空旷的场地，有个旧戏台，开个会、看个露天电影什么的都在那儿。下了工，如天色还早，有些男

人也喜欢到那儿圪蹴，抽袋烟，说说话；待嫁的女儿们，也会在那儿来回走走，炫耀她们的新衣。

现在在村里转来转去，不但找不着下脚的地方，也找不着“中心”了。原来大队有个办公室，里面有部手摇电话，还有过期的报纸，听说现在村里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了，村委会还欠了村民们好几万块钱。但村支书家很排场，不睡炕了，里屋摆着一张漂亮的席梦思床。我们几个开玩笑，说是三星级宾馆的规格。村里“先富起来的”有两种人：干部和“能人”。

我们到当年的知青院去“凭吊”。院墙已经不见了，10间屋子只剩下两间，恰恰有我曾经住过的一间，东倒西歪，破败不堪。俱往矣。

多少年后，考古工作者如果想找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插队知识青年”的物质遗迹，恐怕会有难度。上山下乡的“大潮”退去之后，“沙滩”上留下了些什么？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当年的大队长老蒋，现在一口牙没剩下几颗。老蒋中专毕业，“三年困难时期”返乡，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他说每次报上刊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他都在上面找上河西知青的名字，觉得男生里面一定会有人当上了大官。并没有。

老蒋一直把我们送到县城岱岳。在饭馆吃饭时他喝醉了，说了很多话。他大骂现在的村干部，说他们欺上瞒下，贪污腐败，一点儿也不给老百姓办事。还说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头了，再走下去，从生产到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从他的话里，我感到他对“共同富裕”的理念还有一份执著。他希望我们对村里下一步该怎么办出出谋、划划策。没有一个人接他的话茬儿。

老蒋又跟着我们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站台上只剩下老蒋一个人，他向我们摆手道别，他单薄的身板离我们越来越远。和1973年离开村子时一样，我感到深深的歉疚。

我们回村找寻的，是自己逝去的青春。我们并不真正关心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和他们的命运。说到底，还是两个世界。

（作者简介：叶维丽，1950年生，先后在北京实验二小、北师大女附中读书，1968年底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1989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91—1992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现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

□ 节选自叶维丽、马笑冬：《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2008年。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